

第一部分

来自剩余的挑战

“不能超越人的力量来利用世界广袤的资源 and 保证物质文明进步，世界资源不会减少；相反，发现、发明和组织可以扩大资源利用的可能性，生产充足本身会带来新的问题。”

乔治五世 (King George V)
世界经济大会开幕辞
1933年6月23日

第一章 剩余库存作用的变化

“四海困穷 天禄永终。”

孔子《论语·尧曰》

公元前 6 世纪¹

现在，世界需要找到一个缓解小麦生产过剩造成负担过重的临时措施。

加拿大小麦储备局局长

1935 年²

极少有人对过剩商品库存在 30 年代大萧条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提出异议。这一观点以一种惊人的特殊方式向人们显示出来：1933 年政府发起了棉花休耕和猪羊宰杀运动。³更令人触目惊心的可能是在几年时间内，巴西有意识地焚烧了数以百万袋的咖啡。⁴限制军备国际大会以后，政府间还就小麦、糖、橡胶、木材、锡、咖啡和银生产过剩问题进行了成功的商讨与合作；此外，石油、铜、锌、铝、硝、钾和茶等私人生产者间也举行了类似的国际会议和签署类似的协议。⁵（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 1937 年条件的变化，国际清算银行建议召开限制黄金生产的

世界大会。⁶ 从这些事件和无数类似程度相对较低的合作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流行的观点是认为近期发生的萧条与以往大不相同，属于一种过剩现象，而不是短缺。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事实将胜过任何雄辩。这就意味着我们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条分界线，适用于过去的思考习惯和行为准则将不再具有任何价值或相关指导意义。乍一看，这似乎意味着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已经胜券在握，我们无须花费太大精神力就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仔细分析后发现，利用我们丰富生产能力这一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在现实中却充满着极大的困难和危险。它可能要求政治经济组织最大限度地包容我们的传统和个人倾向。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每一步的推进都将爆发关于利润成本孰大孰小这个极其痛苦，可能也是极为剧烈的论战。与愉快地游览希望之岛不同，希望岛上阳光明媚，牛奶蜂蜜横溢；而我们的命运却可能是在充满疑虑和意见分歧的漫无边际的荒原中探索整整 40 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这是根据我们已经从短缺经济走进了富足经济的假定得出的各种结论。但是，这一假定条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呢？从 1921 ~ 1922 年萧条至 1929 年经济大崩溃的短短 10 来年中，我们经济世界的整个特征是否真的在我们眼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呢？对于头脑清醒的怀疑论者来说，这是不可能的。1921 ~ 1922 年间的金融文献也充满了生产过剩方面的论述；⁷ 所谓过剩多指战争时期的扩张导致的过多生产能力。工商企业巨大的库存及其巨额银行贷款负担同样受到重视。铜出口公司通过筹措资金和启动市场的方法，为部分过剩铜生产寻找出路，已成为当时过剩问题的真实反映。⁸

虽然有许多供给过剩的范例，但我们也发现了许多来自反面的重要意见。传统观点认为，战后萧条是战争破坏的直接后果。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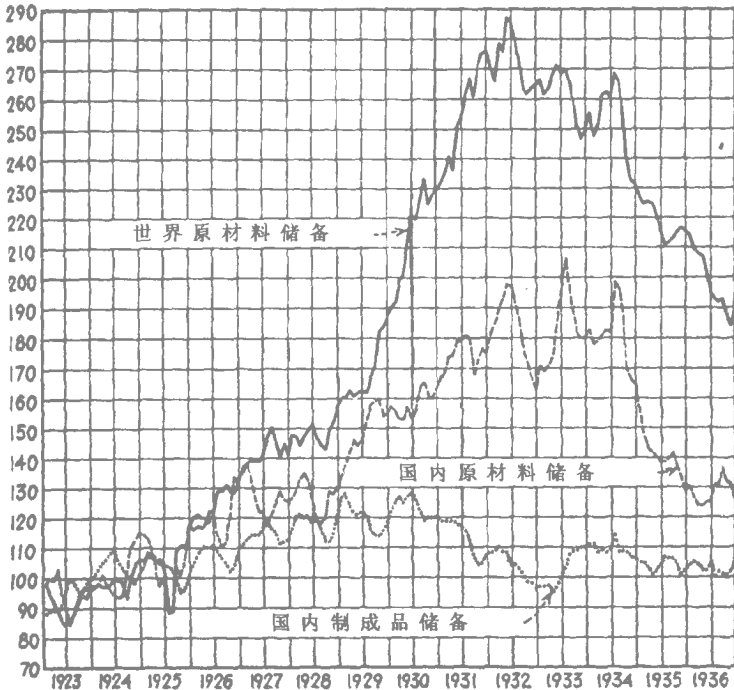
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至少从总体上看，1921~1922年的萧条是一种短缺现象，而非过剩现象。（因为出现了一些修正这一立场的倾向，认为1920年以来的萧条源于生产区位错乱，而不是来自战争导致的破坏。¹⁰）从总体上看，专家们对1921~1922年萧条分析的看法严重不一，在短缺和过剩之间众说纷纭。

分析早期的萧条，我们发现过去的萧条中也都曾出现过过剩生产能力或多余库存等因素。在多数情况下，崩溃或虚脱出现在投机过度或生产过度之后。¹¹然而，与萧条相伴的过分供给与我们目前面临的过剩问题之间还是具有明显区别的。1873年前，铁路的过分修筑意味着某种类型资本设施的建设与一国总体状况不相适应；¹²同样，单个商品经常会出现毫无理由的投机，造成相对生产过度和明显库存多余。但是，过去这类过度生产似乎只表示个别商品领域判断的失误。“困难时期”在某些具体地区可能与临时过度供应联系在一起，但全国意义上的困难时期概念则绝对意味着短缺，特别是指农业歉收导致的短缺。

虽然剩余不是萧条的全新特征，但剩余和萧条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做出这样的结论应当是公正的。从较小和当地化角度看，过剩已经成为导致萧条的主要和普遍的因素。可能仅是强调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但强调重点的变化就意味着问题的实质发生了变化。像多数人所说的那样，认为生产问题已经解决并已让位于经销问题是不精确的。¹³两大问题早就存在，而且仍然继续存在；但人们可能会断言，在我们经济生活中两大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天平不知不觉地从一方向另一方倾斜。我们所见到的周围世界变化的种种迹象和预兆就像在经济荒漠旅游时碰到海市蜃楼一样。考虑新的因素，就会出现新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切不可轻而易举的予以接受。无论新鲜观点的出现还是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都要求试图解决问题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们

谨慎从事。

对与萧条的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过剩商品库存问题的研究将成为最具研究成果的领域；这一命题似乎顺理成章，符合内在逻辑。对各类来源提供的库存统计的研究十分有趣，特别是成品和原材料库存曲线的研究（参见插图）。然而，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运用比较基本的方法来探讨这一问题，分析为什么人们会在商业周期中将大量库存视为经济疲弱的信号，而不是经济强劲的迹象。



剩余库存，或存货，或库存可以定义为超过正常经销过程需

要量的可消费商品积累。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人怀疑这类剩余库存的有益性。剩余库存的经济功能具有两重性：作为有形财富储存下来和预防正常供应出现严重问题。剩余库存的预防功能对于稳定市场价格具有明显的作用；如果没有库存，一旦产量减少，或落荒无收，价格将会暴涨。

库存的这些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些好处似乎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和对目前问题的分析形成了直接矛盾。尽管理论上讲剩余库存可以成为一种有形的财富，但在实践中，库存更多地是发挥负债的作用，而非资产的作用；而且，库存远不能作为价格水平和商业条件的稳定因素，相反，它似乎的确已经成为价格不稳定和商业崩溃的焦点问题。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可能处于一切悖论的核心，而正是这些悖论使得大萧条一下子就与我们的常识格格不入，并让我们感到如此迷惑不解。为了进一步理解其重要性，我们必须简要地回顾一下商品库存在我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各类作用。

在最初阶段，所有财富实际上都由土地和可消费商品构成。部落首领的财富几乎完全根据其拥有的奴隶来衡量¹⁴。几个世纪以后，财产的拥有以各类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表现出来，¹⁵但所有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都可能被称为商品。货币实质上也是商品，是一种附加了特定用途的商品。在此条件下，财富和剩余库存是意思极为相近的同义词。如果谷仓爆满且仓库里存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那么一个国家和构成国家的个人就会被认为十分幸运。库存越多，它就越富有。

工业革命带来了一种新型的财富：机器和安装机器的厂房；后来很快又增加了铁路等其他一些重要的资产类型。与此相一致，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发展促进了现在称为“金融资本主

义”现象的结合，导致了人们财富观念的重大变化。财富变得越来越等同于货币，而货币则日益失去其作为特殊商品的固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银行记账或票据作价的等价物。简言之，财富不再是实物的拥有，而是购买实物能力的拥有。

商业银行业务的发展一方面意味着以储蓄形式出现的货币增多，另一方面，以企业债务借贷出现的债务增多。由此引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流动性。流动性意味着拥有现金或能够随时兑换成现金的资产。¹⁶流动性变得越来越重要，部分原因是由于债务的增长，而债务必须用现金偿还，人们日益强调明智地保有能够兑换为现金的资产；部分因为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财富，现金的身价越来越高，越来越珍贵。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在我们这一阶段中，除了货币因其能够购买其他实物而具有价值外，许多实物之所以具有价值只不过是它们能够转换成货币。

但是，现在极力追求的流动性资金本身的发展涉及许多矛盾的概念，并已近乎荒谬。流动性资金被假定有别于固定资产，相当于亚当·斯密所讲的与固定资本相对的“流动资本”。¹⁷流动资本包括交易经营所需的黄金、白银货币和商品库存。库存商品因为可以进入消费而能够不断地转化为货币，而且库存还可以不断地通过制造加工和进口予以补充。这一古典定义非常通俗易懂和有用。但是，当代社会资产负债表上的流动资金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按其流动性大小排列）：

- 1) 现金；
- 2) 政府债券；
- 3) 其他可投放市场证券；
- 4) 应收账款；
- 5) 库存（可以及时销售出去的合理库存）。

（信贷管理人员倾向于将库存全部从“流动资金”中排除出去，¹⁸将其单独列为“流动资产”一类。）

如果仔细检查前四项流动资金，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流动性是我们金融制度的人为产物，在经济现实中很少有基础。现金等于货币和银行存单，支撑这些货币和存单的一部分是黄金，黄金极难获得；一部分是白银，白银的价值从总体上看被高估了；相当一部分是政府债券，政府债券根本没有资产支持；还有一部分是其他债券和股票，这些债券和股票属于固定资产；现在，还有一小部分是对外商业贷款，商业贷款则属于其他人的债务。“流动资产”后三项属于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存款背后的银行资产。政府债券和其他证券代表资金，并能在正常的业务经营过程中转换为现金，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它们不具备流动性。它们之所以可以流动是因为我们极其发达的证券交易制度为经营活动中的债权债务转让提供了现成的市场，否则，它们就会与我们所分析的流动性概念毫无关系。人们不难看出，最具流动性的证券包括完全从亚当·斯密定义的“流动资本”中分离出来的证券，如政府债券；或几乎全部以固定资产支撑的铁路和公共设施债券；或成功工业企业的普通股票，它们的价值主要来自“利得权益”，“利得权益”被假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任何有形资产都没有关系。

应收账款属于真正的流动资金，但其流动的前提条件在于债务人本身是否具有流动资金。如果将商品库存从流动资金中剔除出去，我们实际上排除了惟一种真正具有内在可兑换性的资产。如果将个人或国家的债务相互抵消，人们如此推崇的流动资金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变得毫无意义。有鉴于此，我们缔造了各种构成财产的概念，论证了什么类型的财产更受他人欢迎；但这些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具体事例予以

支持，它们的有效性取决于人们非理性心理状态的一致性和长期性。

将商品库存在流动资产中的地位降低到目前次一等，或降低到流动资金的不确定状态已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渐变发展过程；但是，1921~1922 年以来，变化的速度大为加快。应当记住，经济衰退是短期库存投机加剧的结果，而库存投机则既是价格上涨的产物，又是价格上涨的原因。随之出现的崩溃导致了库存商品账面价值的巨大损失和由于冒险为商品投机提供融资而造成的危险的银行金融局面。

经历过 1921~1922 年危机的企业对库存扩张几乎都带有一种病态的恐惧。一种单纯为了将库存压缩到最低限度的技术被开发出来。“手供应嘴”临时采购早先只是经济处于萧条非常时期的采购政策，现在成为整个经销领域坚定不移地保护自己的防卫措施。更快捷交通运输的出现和加工制造厂家更可靠的服务为“手供应嘴”采购提供了便利。实际上，为了满足特殊需求而保有商品库存日益成为生产厂家的基本功能和负担。制造商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但他们尽力通过先进的库存控制办法来减轻这方面的负担。¹⁹

朝着同一方向发展较快的还有美国农场主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至关紧要。自古以来，农场主生产的农产品大大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消费需求，但是，他们销售和购买对货币的需求在其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极小，农产品库存是其生活方式的核心内容。他们冬天消费的食品大多属于他们自己在夏天和秋天储存下来的农产品。新一季农作物收获的时候，他们对“超过正常年景的收获给他们带来的货币收入可能更少”的悖论十分熟悉；但是，这一现象与他们对财产的一般看法和经验相去甚远。在他们的概念中，财产和富有不是与货币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土

地、建筑物、农具、牲畜和粮食储存联系在一起。从广义上讲，这类财产积攒越多，他们就越富有。

在农业经济中货币相对重要性不断上升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农产品中用于销售，以换取货币的比重越来越大，农场主消费中来自购买非自己农场生产产品的比重不断增加，购买建筑和农业机器对货币的需要日益增多，农场债务、利息支付、分期付款、农业税收方面的负担日渐繁重，农场主自给自足的成分越来越低。农场主们最终发现他们被众多欲望和义务支配着，而且只有获取大量货币收入，才能满足这些欲望和义务的需要。

这些变化的结果导致农场主向商人转变，他们在其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逐渐养成了商人的习惯，一切皆以货币来计算和衡量。²⁰尤为显著的是，他们对农产品库存，无论自己农场，亦或其他农场农产品库存的看法不断趋向于商人对商品库存的观点。这些库存日益失去本身作为有形财富的储存和预防正常供应出现严重问题的特性，发展成为根据市场条件换取货币的手段或障碍。

现在，我们共和国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农业问题”，其中一些因素似乎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对债务、高利息负担、农产品价格过低、农场主购买品价格过高、运费太高、政治支持明显偏向东方工业化等方面的抱怨由来已久。如果有人认为，胡佛和罗斯福政府一直致力解决的农业问题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那么否定这一观点的事实和权威意见不难找到。但是，这一观点涉及的剩余问题与农产品库存形式不无联系，强调的重点越来越集中于这一焦点问题。无法按公平的价格将农产品销售出去和不能在产量与有效需求间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关系似乎已成为我们农业的慢性病和核心问题，而不仅仅是偶发病和暂时失衡。

这一困难与萧条期间旷日持久的一般商业问题如出一辙，但

它对农场主的影响远大于其对加工制造商的影响，因为根据需求变化调整农业生产的难度极大。²¹有人声称，农场主对付价格崩溃导致的金融危机的惟一办法是“继续大面积种植农作物”。²²我们发现，商人和农场主都受到商品过剩的煎熬，并且都认为过剩是其痛苦的根源。

现在我们将这些看法和经验导入我们商业经济中的库存机制功能。我们发现库存机制具有一种逆反的特征。这种逆反特征令人十分迷惑不解。库存的正常功能是缓解产量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产量大于需求时存储，在必要时动用储备。但是，一旦按错电钮，库存或存储机器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动。投机可能会造成在产量极为丰盛的时候囤积居奇，制造人为的商品供应短缺现象，给人们造成错觉，扭曲正常消费对需求和产量的反映信号。

价格是赖以保证库存机制在正确方向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过分生产条件下的低价是建立库存的诱因；相反，一旦产量急剧减少，或需求急剧增加，库存就会用来满足市场上存在的需求。然而，这一供应和需求的古典定律不会自动和客观地运转，而是通过商人良好的常识来运作。如果常识一方面被投机冲动所支配，或另一方面又受到投机忧虑或资金需求的制约，我们就将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这种状况我们在证券市场上太熟悉了：通常情况下，价格攀升会诱导证券吃进，而价格下跌则导致抛出。

经济学家们倾向于将这类供给需求法则的矛盾现象视作不会影响商业根本结构的暂时背离。然而，可能出现的事实是，在过去 15 年中商人们对积累下来的巨大库存近乎病态的恐惧确实已经构成了影响库存机制作为商业周期繁荣和萧条时期稳定因素正常功能发挥的可怕障碍。在某种条件下，这一障碍本身证明，对于在商业活动中，即使在价格高涨中也积累商品库存的任何人来

说，商品库存的增加令人深恶痛绝。在经济严重萧条期间，我们发现我们急需削减累积库存，决不能任其自生自灭。

许多研究者发觉，金融资本主义的进步增加了我们经济体制的复杂性和严密性。雇主和雇员都受到非自己所能控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非自己知识范围所及的力量的左右；商业结构失衡条件下，内在动力及时和有效地恢复与调整经济作用的发挥变得更为困难。现代经济生活中这诸多令人难以满意的现象不少都与商品库存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有关。有关这一点，我们现在发现单个商人（和农场主）的个人决策与我们传统和常识意义上的国家利益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矛盾。对于整个国家来说，物产丰盛明显是一件大好事；但我们是否应当在手头存有大量库存呢？大量库存的存在是否就意味着物产丰盛呢？然而，我们现在的商业习俗和心理与这一原理明显相悖。

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间的差别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如果众多公民中的个别人因大量过剩库存的存在而受到伤害，难道构成国家的全体公民就肯定不会因此而受到伤害吗？许多政府发起的决不会对美国造成伤害的国家紧缩（甚至自毁）计划背后的原因和苦衷是否已经为大家所理解和认识到了呢？实际上，过剩这一魔鬼不仅从个人危及到国家，而且从多个国家蔓延到构成经济实体的整个世界。本章开篇引证的，1935年干旱期间加拿大粮食局局长的声明，典型地反映了对库存广泛认可的态度：“现在，世界需要找到一个缓解小麦生产过剩、负担过重的临时措施。”

鉴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过剩库存确实成为国家的债务，而非财富，其根源不在剩余产品本身的内在邪恶性，而在于商业机制功能的发挥。世界小麦过剩不可能带来类似雨水过多，战争过多或受灾害影响人数过多意义上的危害。任何人都会承认，自然资源充裕是构成一个国家和整个世界

财富的源泉。具有无限经济价值的资源在埋藏于地下时，通过开采和赋予其经济用途的提炼加工可能会转化为有害的物体；对这一认识的过分相信将会把我们带入误区*。

即使最保守的人也必须认识到，近来把个人过剩商品储存转化为国家灾难意味着对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严厉控告。“富贵不忘贫贱”已经成为一种老生常谈；但是，新鲜感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包含的深刻含义不复存在。在较单一经济条件下，善良女神的主要作用无疑是济贫馈赠，现在，重新恢复这类作用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在这一永不停止和永不满足的世界中，本身生产率发育不全的商业机器必难长期为继。

* 与这一认识相对应的只有非常态条件下的反黄金开采和储藏。十分明显，目前对付这一极其昂贵和人人喜欢的金属的惟一可行办法是，完全废除黄金的使用，让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将其回归人造金矿，深深埋藏于地下。

第二章 政府与剩余储备

让他们将丰年的食品积攒下来，并盖上法老的大印封存起来；让它们保存在城市中。

《创世纪》第 11 卷第一集第 35 章

前一章我们分析了剩余、商业关系发展的几个不同的阶段。在其最初阶段，财富衡量标准极为单一；对国家和个人都一样。在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商品过剩经常构成对不同集团利益的损害，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剩余总好于稀缺。根据近期这次萧条的显著特征，第三个阶段似乎已经到来。在这一新的阶段中，商品过剩的破坏性效应从个人或集团扩散到整个国家，甚至世界经济。

剩余因此而构成了对国家的挑战。如何迎接这一挑战呢？研究能抵消当代经济生活中剩余使商业机器反常运转影响的政府政策是否可行呢？政府是否只能在无能为力和对生产各方面实行全面控制间做出抉择呢？简单回顾一下过去为解决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可能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国家对付实际或威胁中的剩余可以有四种方法：预防、销毁、倾销或储存。今天，世界各地的国家政府实际上都在采用这

四种方法。然而，研究这方面的历史记录后，我们发现首先必须划清两个方面的界限。第一是划清原材料和制成品间的界限。政府针对剩余所采取的行动主要适用原料性产品。某种类型的政府行为确实已经影响到欧洲控制加工制成品的卡特尔。¹美国全国（工业）复兴总署提供了一个较有意义的例外——颁布了一项特殊的立法，授权政府（在非常时期）制订为限制工业生产而采取各类制裁和援助措施。²然而，无需指出，政府的典型态度却截然相反，他们所采取的方法通常是禁止生产和动员所有制造业厂家共同限制产量，或禁止厂家将库存投放市场。

与此相反，即使在 1930 年之前，政府偶尔也采取一些限制农产品剩余的措施。第一个巴西咖啡价格稳定计划开始于 1905 年。³此后的几年中，政府分别对鸡、棉花（埃及）、葡萄干、糖和橡胶等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让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情况，我们注意到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州州长于 1926 年 10 月宣布实施“棉花管理周”行动，⁴同年，库利奇（Coolidge）总统致信国会建议削减 1/3 的棉花种植面积。⁵当然，所有这些均属于政策建议，而非法律条例；但是，它揭示了政府态度的变化；仅在几年之前，联邦政府代理人还曾对硬木制造厂家利用类似的理论限制产量起诉，并认定这种行为非法；现在，政府也采取了农业限产政策。

棉花和加工硬木案例间必然存在着某些根本性的区别，因为政府在这两种产品中截然不同的态度没有招致对政策不一的广泛批评。两个似乎有道理的论点可以为将原材料与制成品区别对待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第一个论点是，相对制成品来说，原材料更重要，是基础，理应予以优先考虑。关注农业条件的稳定被视为政府的特权，因为农业稳定能够为整个工商业创造满意的条件。另一具有同等份量的论点是，制造商根据需求变化调整生产远比农场主简单得多；因此，在应当进行限产干预时，必须对农

场主提供帮助，而对于加工制造商，则需要防止他们过多地采取完全自发且不受欢迎的限产措施。这些理论是否成立不是我们现在想要探讨的问题。我们探讨的重点在于指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背后的理论依据。⁶

第二是划清 1930 年以前所采取政府措施与根据这次大萧条而制订的政府措施的界限。事实上，将史料记录划为三段，可能更有利于对问题的分析：第一段，从有史以来到 1900 年；第二段，此后的 30 年；第三段，从 1930 年至今，时间虽然很短，但却极为重要。我们将介绍，在 20 世纪之前的年代里，国家对农业剩余的基本态度是：一、促进；二、储存起来，以备后用。进入本世纪以后，我们首先发现，农业剩余正在成为一个长期的和普遍的问题，为了保证生产者良好的价格，需要国家予以干预。战争创造了世界性稀缺局面；但是，十分难得的和平恢复以后，剩余问题也接踵而至；1919~1929 年间，政府价格支持和限制生产的政策措施急剧增加。在目前这一阶段中，我们发现各类控制技巧得到进一步强化，并补充了许多新的和特别的措施。

剩余储存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政府政策，也是我们强调的重点。为方便起见，我们将在简要讨论剩余的预防、销毁和倾销这三种政府措施后再来分析这一问题。

本世纪开始之前，国家实施的限产政策都带有掠夺的性质，旨在让某些人获得好处，而不是产量被限制者。例如，限制在殖民地里可能与宗主国构成竞争的商品和制造业的发展是标准的殖民政策。1669~1763 年间，法国路易斯安那政府曾禁止大麻的种植和亚麻织品的生产；与此同时，西班牙也曾限制其许多占领地种植葡萄。源于政府直接垄断和授权代理垄断的其他类型的限产措施层出不穷。烟草经营垄断是最普遍和最流行的垄断。早在 1619 年，英国王室和弗吉尼亚公司达成交易，结果导致为了保